



# 神入與想像—簡釋考古遺址對歷史教學的意義

● 陳能治\*

2013年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配合「鄭成功祭典暨開台352年週年紀念活動」，舉行「蔦墩西拉雅—從蔦松文化到西拉雅」特展；2014年再度與台南地區考古遺物聯結，向下營區武安宮洽借五件新石器時代巴圖型石器，舉行「巴圖湖漾—大湖文化特展」。

以上案例顯示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企圖將考古及文獻記錄結合起來，以重建鄭成功與西拉雅族「文化交會」(cultural encounter)的歷史，也企圖將大台南歷史的時間與空間，往前追溯到「以千年」為單位的大台南地域史，也就是向前拓展到考古遺址的文化遺留，此舉在喚起市民對大台南地區考古遺址的注意，及大台南地區歷史的重建上，實具意義。

原民部落民族誌切入台灣史前史的研究與教學，已受到廣泛的注意，相較而言，考古遺址較未受到重視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作法一大突破。

技職體系歷史教學，歷史事實與史事演繹非主要教學目的，主要教學媒材為視覺、影像材料，則提供歷史事件之空間與時間，促使學生進行史事的「歷史圖像」想像，進而能抒發「思古之幽情」，史前考古的教學是一種新的嘗試。

考古遺址如「凍結在某個時空中的一個史書，書中記載著豐富的先民生活資料、古代人類與大自然活動的內涵，以及人類文化變遷的過程」，透過考古學和其他相關學

\* 陳能治，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副教授。

科的研究、解析，它們「似乎又鮮活的呈現在人類的舞台上」。1《考古》編者尼可拉斯·魏德(Nicholas Wade)說：2

那些考古挖掘出來工藝品的製造者…，他們是晃來晃去、形影模糊的幽靈，只不過被考古者施法從地下世界中召喚上來，逗留片刻，讓那些久已消逝的古文明在我們的眼前閃爍一剎那…。雖然考古發現幾乎能使往昔死而復生——至少在想像中，考古學卻不是什麼妖術，它是歷史學的一個獨特分支，是靠不斷進步的技術手段和智慧學識作為基礎的一門學科。

考古遺物可以帶來無盡的想像，帶給人們對「人」自身有更深沉的了解，讓人們關懷時空領域無盡擴大延展，促使人們正視文化相對價值的多元觀點，是革命性的。

迦達瑪(Hans-Georg Gadamer)談詮釋學，指出一尊古代神像立在我們面前時，仍然包含著該神像由之而來的宗教經驗的世界，這古代神像過去矗立於神廟中，今天它又陳列在現代博物館中，這樣的神像同時就具備同等意義的效果，即它的世界也屬於我們的世界，這就形成了包括兩個世界的詮釋學天地。3

保羅·G·巴恩在《劍橋插圖史前藝術史》指出，史前藝術在當初創作者所處之地，依舊體現出「精神力量和當地居民所面臨的危險」，參訪者仍然感受得到「簡單的美感」，感染「緊張的氛圍」。4如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，或台南科學園區、台北芝山岩等考古遺址，學習者可以透過石器、陶片的觸摸，神遊於 3500 年前的時空，進行個體的轉化。

著名考古學家費根(Brian M. Fagan)在其名著《地球上的人們》中，闡明學習考古學的理由，因周圍人類生活周遭有許多令人肅然起敬、歷盡滄桑的文明廢墟，而「這些廢墟繼續啟迪著人們，讓我們設法在一生中，至少遊覽一個大考古遺址」，「驚嘆先民在地球上的成果，感受它們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」。5若此而言，台南地區近在咫尺的南科考古遺址，為台灣史前教學之最佳場所。

<sup>1</sup> 劉益昌，《台灣的考古遺址》(台北：台北縣立文化中心，1992)，頁 1-4。

<sup>2</sup> 趙沛林，Nicholas Wade 原著，《考古》(台北：知書房，2002)，頁 i-ii。

<sup>3</sup> 潘德榮，《詮釋學導論》(台北：五南，1999)，頁 135。

<sup>4</sup> 郭小凌、葉梅斌譯，Paul G. Bahn 原著，《劍橋插圖史前藝術史》(山東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04)，頁 255。

<sup>5</sup> 賈士衡，《古人類古文化》(台北：五南，1991)，頁 8。

以南科西拉雅文化層及蔦松文化層為例，蔦松文化距今 1800 至 500 年前，西拉雅文化層距今 500 年至 300 年前；蔦松文化晚期與西拉雅文化層，展開南科考古遺址鳥瞰圖，猶如置身於一個 350 餘年前沉默的地下世界。遙想在這個世界裡，村落內戶戶相隔甚遠，每戶前面有個小空地，種植蔬菜、水果等，周圍陸地為灌木林，有許多苦楝樹、朴子樹等，鹿群、羌及野豬散佈。他們居住的村落，近有河流，遠有內海，海邊有許多紅樹林。鹿群、羌及野豬隨處可獵，尚有鼠、松鼠、果子狸、兔、雲豹及蝙蝠等。房舍為土臺式建築，旁邊挖有水井，種著水稻及蕙苡，拿著竹響器趕鳥。他們豢養著狗及貓等，狗是他們最親近的朋友，死後妥善安葬牠們，並給予陪葬品。<sup>6</sup>

歷史是一幕人間戲劇，歷史教學必須給予史事的「空間」舞臺，考古遺址所呈現的「空間」與「時間」架構，是傳統歷史教學的一種突破。舉例而言，論及鄭成功在台南，與其相遇的平埔族，其用具、外貌、飾物、居所、喪葬儀式等等，究為如何？南科考古遺址的蔦松文化晚期與西拉雅文化的實體挖掘出土物品，比文獻上的文字記錄，更具體，更實際，更可觸及，有助於學習者發展出更具像的「圖像式思考」，激發對史事的神入與想像。

此外，史前考古學也讓學習者從全體人類、全球的角度來對待歷史，考古學證據揭示了人們如何生活？生產什麼？商業交換的方式？如何生活？水準多高？使用哪些技術？因此，學習者打開了「歷史時期」空間與時間的有限性，回到沒有種族藩籬，用全域的角度來對待歷史，此可超脫當前台灣史教學政治詮釋所衍生之紛擾，有助於建立真正屬於「全體住民」的台灣史。

---

<sup>6</sup> 臧振華主編，臧振華、李匡悌著，《南科的古文明》（台東：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，2013）。